

PLC 工作论文

w009

2009.07



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 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

PEKING UNIVERSITY - LINCOLN INSTITUTE

Center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d Land Policy

户口、迁移与居住分异

——以武汉为例的实证研究

PLC WORKING PAPER SERIES NO.009

http://new.plc.pku.edu.cn/publications_ch.aspx

2009. 07

黄友琴 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地理与规划系 副教授
北大-林肯中心 访问研究员

易成栋 中央财经大学城市与房地产管理系

北京大学廖凯原楼508室, 北京 100871 中国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不代表北大-林肯中心及相关机构的观点与立场。文章作者与北大-林肯中心共同拥有该工作论文的所有版权, 若需转载或引用文章中任何内容或数据, 须事先得到版权所有人的书面许可, 并明确标注资料来源。

户口、迁移与居住分异 —以武汉为例的实证研究

黄友琴 易成栋

(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地理与规划系, 奥尔巴尼, 纽约州, 美国, 12222;
中央财经大学城市与房地产管理系, 北京 100081)

[摘要]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程度很低。转型期间快速的城市化和住房的市场化导致了大量人口的迁移迁居, 使原来相对均质的单位社区转变为多元的、异质的城市空间, 各种新型社区如破旧的移民社区和富有的门禁社区也都应运而生。城市的居住分异日益明显, 居住区位也日渐成为社会经济地位的标志。根据武汉市 2000 年人口普查 0.1% 按户抽样数据, 本文将市区人口分为市内未迁居居民、市内迁居居民、市外永久移民、和市外暂时移民, 从户口、迁移迁居和居住的关系分析不同人群在城市中的居住区位及分异状况。与西方城市相比, 武汉市区目前的居住分异和隔离程度不高, 但各分区的居住隔离程度存在明显差异, 特定人群在城市某些区位的分异隔离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各类人群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孤立性。政府相关部门应对此予以重视。

[关键词] 户口; 迁移; 迁居; 居住分异; 武汉

1 前言

在计划经济时期, 城市住房作为一种社会福利, 主要由单位和政府提供, 居民没有选择住房和社区的权利, 中国城市形成了以公房租赁为主要住房方式和单位大院为主的组团式社区的特征。虽然单位之间住房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是不同社会阶层在城市内部相对均匀分布, 城市居住空间结构相对均质和单一, 与西方的居住分异和隔离形成鲜明的对比^[1, 2]。住房制度的改革和住房市场的发展为消费者根据自己住房偏好和支付能力选择住房和社区提供了可能。近年来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分化和大量的市内迁居导致了居民在社会空间上的迅速分化, 逐渐打破了原来相对均质的社会空间属性。同时, 快速的城市化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导致了大量人口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自由流动。但是在现有的户籍制度和住房制度下, 流动人口在制度上和社会上依旧处于不利地位, 他们一般不能享受补贴性住房, 住房选择也有限。因此他们通常在城中村聚居, 形成与富裕的门禁社区截然不同的社会空间, 加剧了城市居住空间的异质性和多元化^[2]。快速的城市发展也导致了大量的拆迁和市内迁居, 进一步促进居住分异。学者们对中国转型期间居住分异和城市社会空间极其关注, 研究了居住分异的机制、影响因素, 以及特定城市的空间分化, 例如北京、上海、广州^[2, 3, 4, 5, 6]。本文选取了中部特大城市武汉为例, 从迁移迁居和户口制度的角度来分析住房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和城市化对居住分异的影响。

2 人口迁移、迁居和居住分异

人口迁移、迁居和居住分异在西方有很深入的研究。一般而言, 在单个住房市场内的迁移(也叫迁居)多与家庭对住房需求的变化和住房市场的结构有关, 而在住房市场间的迁移多与就业的变动和就业机会有关。两个机制通常分开研究。只有少数研究试图把迁移迁居、住房选择和就业结合起来研究, 认为三者的决策过程不可分割, 受家庭特征、收入和地方特征影响^[7]。迁移迁居的空间结果通常是居住空间分异和隔离。自芝加哥学派学者伯吉斯(Burgess)、派克(Park)等提出了同心圆理论以来^[8], 居住分异一直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一般认为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家庭人口特征和种族是当今西方影响人们住房选择行为和居住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其基本观点是: 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展, 市外迁移人口的进入, 市区住房的老化, 高收入家庭逐渐由市区向郊区迁移, 旧住房过滤到低收入家庭, 并形成了不同的社区。少数民族尤其是第一代移民通常集聚在城市中心, 随后逐渐郊区化但一般晚于主流社会。由于收入不平等和种族歧视, 主流社会和少数族裔之间的居住分异和隔离程度较高^[9, 10]。

在计划经济里, 由于住房是一种社会福利, 由单位和政府提供, 居民基本没有选择住房和社区的自由,

形成以公房租赁和单位大院为主的城市居住空间。又由于中国的城市管理制度和户籍制度对人口的自由流动施以限制，农村移民不能自由进城定居，城市居民也不能自由迁移迁居，造成了居住结构相对稳定，均质和单一。所以城市社会空间主要由城市规划、产业和职业决定^[11, 12]。

中国转型期间由于市场机制和原有的计划经济下的体制共同作用，迁移迁居、住房选择和居住分异形态和机制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有不同之处，而对其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城市的社会空间分化进程。一方面，住房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其他市场因素开始起作用。人们可以因为工作机会和住房需求的变化而迁移迁居。住房改革以及住房市场化给居民提供了住房选择的自由和可能，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社会经济地位、家庭需求和住房偏好选择住房产权、类型、质量和邻里，并通过迁居来实现^[13, 14]。此外，房产商根据住户的偏好和支付能力提供不同层次的住房和社区。经济社会转型促进了社会分化，不同阶层在住房偏好和需求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居民的住房选择也具有社会经济地位的象征意义。因此迁居改变了相对同质的单位社区为主的城市空间，形成异质的、多元化的社区。同时，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快速的城市化和大量的来自农村和城市的移民，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和城市空间的分异。

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下的机制依旧重要，仍然约束人们的迁移迁居。例如，现有的城镇住房制度决定了户口是影响住房选择的重要因素。只有拥有本地城镇户口的人才能享受补贴性住房，如原有公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虽然近年来商品房出售基本上对所有人开放，但是住房公积金贷款和银行商业贷款都是针对具有本市城镇户口的居民。所以非户籍迁移人口（无论来自农村或其他城市）在目的地住房选择非常有限^[13]。他们经常集聚在城乡交界处或城中村，形成特有的社区和城市形态^[15]。另外，政府和单位依旧在住房建设中起重要的作用。政府集中建设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以及工作单位集资建房都形成了特有的城市空间。

虽然户口、迁移迁居、住房选择和居住分异紧密相关，但是对它们相互关系的研究并不多。仅有的研究也通常把城市人口分成本地人和外来流动人口，关注他们之间住房和社区的差异^[6]。事实上户籍制度和近年来快速的迁移迁居将城市人口分成了多个不同阶层，这种二分法已经不能体现现实。同样是外来人口，市外永久迁移人口和市外暂时移民人口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特征^[17]；同样是本地市民，市内迁居人口与一直没有迁居的人口也出现了社会经济、住房消费和居住空间的分异。因此本研究把城市人口分成四类：本地未迁居居民（也叫本地居民，local residents）、市内迁居居民（residential movers）、市外永久移民（permanent migrants）、和市外暂时移民（也叫流动人口）（temporary migrants）、并分析他们在城市中的居住分异和隔离。

3 武汉市居住分异

本文以武汉市为例实证研究。武汉市是湖北省的省会，中部的特大城市之一。武汉市按行政区划分为市区（包括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 7 个主城区以及东西湖区、汉南区 2 个近郊区）和郊县（蔡甸、江夏、黄陂、新洲 4 个区）两个部分。按照惯例，本文研究只覆盖市区（主城区和郊区），不包括郊县。市区又根据建成区形成的阶段，以 2000 年人口普查的街道乡镇为基础进一步划分成 4 个层次，分为：老城区，共 35 个街道；新城区，共 40 个街道；城郊结合区，共 14 个街道或乡镇；远城区，共 26 个乡镇或街道^①。本文利用权威的 2000 年人口普查 0.1% 按户抽样数调查数据。研究范围内共有样本 489851 人。

首先将城镇人口根据户口登记状况、户口性质、迁移时间和迁出地分类如下：“本地未迁居居民”为从出生起居住在本地，且户口在本地和居住在本地的人口；“市内迁居居民”为来自于武汉市其他街道，居住在本地和户口在本地（或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以外 - “人户分离”）的人口；“市外永久移民”为来自于武汉郊县和武汉以外，并且户口在本地和居住在本地的人口；“市外暂时移民”或“流动人口”人口为武汉市区以外的人口，居住在本地和户口在外乡镇街道；此外为“其他”。

3.1 武汉市区人口的来源

2000年武汉市市区各类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如下：本地未迁居居民占28.0%，市内迁居居民占13.9%，市

外永久移民占34.6%；市外暂时移民占22.7%，其它占0.8%。由此可见，所谓的“本地人”已经不占绝对人口优势，从市外迁入的人口则超过57%。按户口和迁移状况，武汉市区人口已经非常多样化。本地未迁居人口、市内迁居和永久迁移人口以非农业户口为主，市外流动人口则是农业户口（57%）比非农业户口（43%）略多。

3.2 武汉市内人口迁居和市外迁移

由于数据的限制，5年以前迁移的人没有迁出地信息。这里仅分析1995年11月1日以后最近5年的移民（新移民）的来源地和迁入街道。最近5年市内迁居人口占总迁居人口的100%，最近5年内的永久移民占总永久移民的15.8%，而最近5年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48.4%。

不同类型的新移民有不同的迁移原因。市内迁居移民最主要的原因是拆迁搬家和随迁家属，占该类移民的54%；永久移民最主要的原因是学习培训，占该类移民的89%，这和这类人主要是武汉大中专院校的学生有关，占了该类人口的89.3%。暂时移民的主要原因是务工经商，占该类移民的57%。

从迁出地和迁入地来看，市内迁居主要发生在同一行政区内，按照街道划分，来自于市区的迁居居民主要迁往老城区和新城区；而来自于近郊区的迁居居民主要迁往城乡结合部和远郊区。如表1所示，永久移民主要来自于湖北省（55.3%）和省外（38.8%），绝大多数住在新城区（80.0%），其次是老城区（13.6%）。暂时移民主要来自湖北省武汉以外的地方（63.0%），主要是迁入新城区（40.5%），老城区（33.9%），城郊结合区次之（19.8%）。和永久移民相比，暂时移民来源更集中，但在迁入地分布更均匀。总体而言，无论是迁移还是迁居都符合距离衰减的原则。

表 1 5年内迁移的永久移民和暂时移民的迁出地和迁入地

迁入地	迁出地			
	武汉郊县	湖北省	湖北省外	总计
市外永久移民				
老城区	0.7	7.5	5.4	13.6
新城区	4.5	45.0	30.5	80.0
城郊结合区	0.4	1.8	1.8	4.0
远城区	0.2	1.0	1.1	2.4
总计	5.9	55.3	38.8	100.0
市外暂时移民				
老城区	3.6	22.0	8.2	33.9
新城区	4.2	25.1	11.2	40.5
城郊结合区	3.6	12.2	3.9	19.8
远城区	0.7	3.7	1.5	5.9
总计	12.1	63.0	24.8	100.0

3.3 武汉各类人口的居住区位分异

总体而言，武汉人口相对集中，但已经出现郊区化。有近半的人口（48.6%）分布在新城区，近30%的人口分布在旧城区，14%在城郊结合区和8%在远城区（见表2）。各类人群的分布基本与城市总人口的空间分布形态相符。比较而言，本地未迁居居民的分布相对比较平均，主要是住在新城（38.7%）和老城区（31.8%）。市内迁居人口和永久移民在新城区的集中度最高（分别为54.7%和59.5%），永久移民住在城郊结合部和远城区的比重较低（分别为6.9%和5.2%）。暂时移民住在城郊结合区的比重是四类人群中最高的（21.4%），和永久移民有尤其明显的不同。这和城郊结合区城中村具有大量便宜的住房相关。

由于各类人群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他们占街道总人口的比例也有明显不同的空间形态。人口比重具

体街道分布见图1到图3。

表 2 武汉市人口按户口、迁移迁居状况的空间分布

%	老城区	新城区	城郊结合区	远城区	总计	总人口
本地未迁居居民	31.8	38.7	15.5	14.0	100.0	13962
市内迁居居民	24.7	54.7	16.3	3.8	100.0	6911
市外永久移民	28.4	59.5	6.9	5.2	100.0	17262
市外暂时移民	30.7	40.6	21.4	7.3	100.0	11308
其他	20.6	33.6	22.1	23.8	100.0	408
总计	29.3	48.6	14.0	8.1	100.0	498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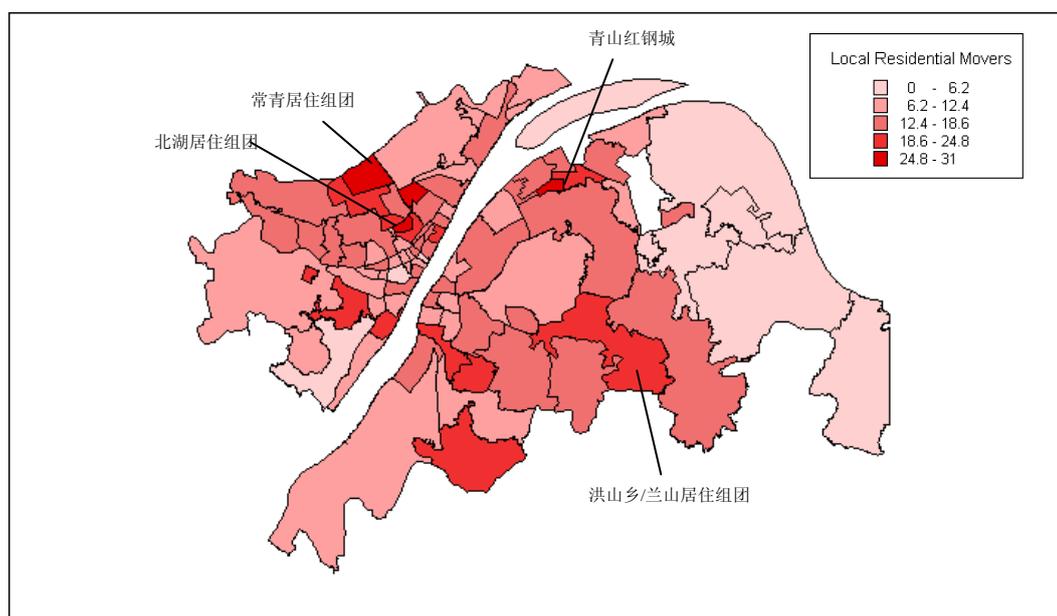


图1 武汉按街道分的市内迁居居民占街道总人口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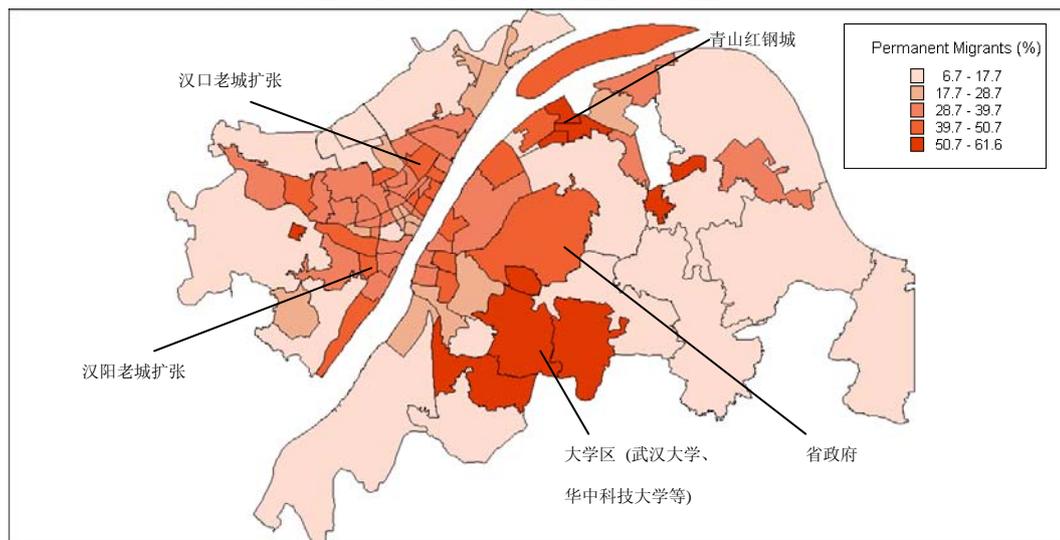


图2 武汉按街道分的永久移民占街道总人口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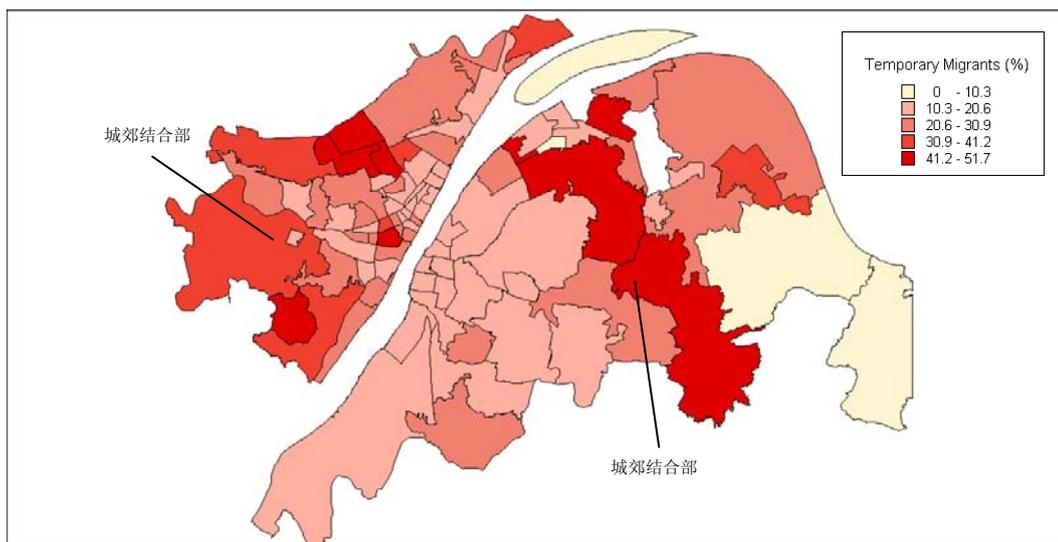


图3 武汉按街道分的暂时移民占街道总人口比重

在以街道为单元的地图上还可以看出，各类移民的空间分布明显不同，存在一定程度的互补。随着新城建设和老城改造，市内迁居居民在老城周边的新城街道比重较高，例如汉口和汉阳老城的扩张和青山区的红钢城建设、大型居住组团建设导致了大量的市内迁居；永久移民也是在老城周边的新城街道比重较高，但是略有不同，例如在省府机构所在地和高校所在地的街道永久移民比重较高，这和省政府官员调动以及大学城建设和高科技园区建设有关；暂时移民则是在靠近老城区和新城周边的城郊结合部比重较高，因为这些地方既接近城区就业中心，又存在大量城中村，能提供廉价租赁住房。

居住分异指数（dissimilarity index）和孤立指数（isolation index）常用来衡量居住分异和隔离的程度^[16]。具体计算公式见注释 2^②。这里以街道作为最基本的空间单元，计算了以市区为总体，以老城区、新城区、城乡结合区和远城区为总体，和以主城区和近郊区为总体的居住分异指数和孤立指数（表 3）。两个指数均取值 0-1，指数越大，人口分异和孤立程度越高，即居住隔离程度越高。

西方按照分异指数划分居住隔离程度的标准是低（0.3 以下），中（0.3-0.6），高（0.6 以上）^[18]。从城市市区总体来看，武汉市 2000 年的居住隔离程度相对较低，分异指数在 0.20 和 0.25 之间。但各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在远城区，各类人口的分异指数均高于 0.3，表明中等程度的隔离并高于城市其它地区。尤其是市内迁居居民，分异指数高达 0.53，已经接近高度隔离的界限（0.6）。这可能与武汉市商品房建设在远城区空间分布不均衡相关。市内迁居居民在老城区和新城区，本地未迁居居民在老城区，永久移民在老城区，和暂时移民在新城区的隔离程度都很低（小于 0.2）。当按照行政区分成主城区和近郊区时，主城区的分异指数都很低，而近郊区则有中等至高的分异（0.51-0.65）。这显示了武汉市人口分布不均衡主要在城市外围（近郊区或远城区）。

表 3 武汉各类人口的居住分异和孤立指数

	分异指数				孤立指数			
	市内迁居居民	永久移民	暂时移民	本地未迁居居民	市内迁居居民	永久移民	暂时移民	本地未迁居居民
武汉市区	0.20	0.25	0.23	0.23	0.17	0.40	0.28	0.34
老城区	0.16	0.17	0.25	0.12	0.13	0.36	0.30	0.32
新城区	0.16	0.20	0.15	0.21	0.18	0.45	0.21	0.26
城郊结合区	0.20	0.28	0.20	0.25	0.19	0.23	0.38	0.36

远城区	0.53	0.30	0.31	0.36	0.26	0.29	0.27	0.57
行政分区								
主城区	0.17	0.22	0.21	0.19	0.16	0.41	0.24	0.27
近郊区	0.65	0.62	0.51	0.51	0.36	0.38	0.70	0.96

孤立指数越高，表示少数群体越孤立，与其他人群的联系越少。总体而言，永久移民、暂时移民、和本地未迁居居民中度孤立（0.28-0.40），而本地迁居居民孤立程度最低（0.17）。意外的是永久移民（0.4）比暂时移民（0.28）更孤立，这可能和永久移民主要是大专院校学生，分布相对集中有关。空间上，孤立指数也有较大分异，尤其是本地未迁居居民和永久移民。本地未迁居居民在远城区孤立程度最高（0.57），在新城区最低（0.26）。永久移民孤立程度在新城区最高（0.45），其次是老城区（0.36），在城郊结合部最低（0.23）。暂时移民在城郊结合部（0.38）和老城区（0.30）的孤立程度较其他地区高。市内迁居移民在城市各区的孤立程度都较低。从主城区和近郊区分，暂时移民（0.70）和本地未迁居居民（0.96）在近郊的隔离程度非常高，而其他人群在主城区和近郊都只有低到中等程度的孤立。这和分异指数的空间分布有所不同。

4 结论

中国的制度转型和经济改革带来了个人收入、社会地位等的变化，出现了快速的社会分化和分层。中国城市内部空间也因此出现了分异、重组和排序。计划经济下的以单位大院为主的相对均质的城市空间正逐渐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异质的和多元的城市空间，居住分异和隔离也逐渐出现。这主要有两个机制作用。第一，住房改革给居民提供了自由选择住房（产权、质量、种类等）和社区的权利，住房市场化为居民提供了各个层次的住房和社区，以满足不同阶层的需要。近年来中国城市中大量的迁居正是居民实现他们住房选择的体现，从而使社会分层空间化，导致居住分异。出现了从别墅区到单位大院的一系列不同社区。同时，快速的城市拓展和旧城改造，造成了大量的迁居，加速了城市居住分异。第二，快速的城市化导致了大量的来自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暂时移民。劳动力市场的开放给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但是在现有的住房制度和户籍制度下，暂时移民无权享受住房补贴和很难获得住房贷款，他们的住房选择受到约束，通常只能租赁城中村、城市居民的私房或住临时性的住房如工厂宿舍，形成鲜明的移民社区，进一步加剧了居住分异和隔离的程度。换言之，中国城市的居住分异受到了新生的市场机制和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共同作用。一方面，市场机制导致了社会分层，而迁移迁居使之空间化；另一方面，户籍制度又约束移民的住房选择，使他们集聚于城市中特有的社区。二者共同导致了城市居住分异和隔离。

本文以武汉市为例实证研究了户口和迁移迁居对居住分异的影响。研究表明，武汉市人口多样化，分为市内未迁居居民、市内迁居居民、市外永久移民、和市外暂时移民。他们的居住区位存在明显的差异，这说明户口和移民类型依然是影响住房获得的重要因素。与西方城市相比，武汉市区的居住分异和隔离程度目前还不高，但各分区的居住隔离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特定人群在城市某些区位的分异隔离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而根据国外的经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和经济社会分化的加剧，居住分异会进一步加剧，因此中国城市在转型期间必然会面临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政府的规划和公共政策来降低居住分异隔离，避免居住分异隔离的进一步恶化，并减少居住分异带来的社会问题。

[注释]

①武汉市按照街道划分的四个区域依据来自于武汉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②分异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D = \frac{1}{2} \sum_i \frac{t_i |p_i - P|}{TP(1-P)}$$
，其中 t_i 和 p_i 分别为 i 区域的总人口和少数群体人口占该区域总人口的比重， T 和 P 为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少数群体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对于基于户口和迁移的居住分异，本地未迁居居民为多数群体，其他类型为少数群体。

孤立指数计算公式为：
$$P_x^* = \sum_i \left(\frac{x_i}{X} \right) \left(\frac{x_i}{t_i} \right)$$
，这里 x_i 和 t_i 是区域*i*（以城市作为总体）的少数群体的人口数量和总人口数量， X 是少数群体在城市的总人口数。

[参考文献]

- [1]张京祥, 罗震东, 何建颐.体制转型与中国城市空间重构[M].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7:97-99.
- [2] Huang, Youqin. From Work-unit Compounds to Gated Communities: Housing Inequality and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Transitional Beijing [A]. in Laurence J.C. Ma and Fulong Wu (ed.) Restructuring the Chinese Cities: Changing Society, Economy and Spac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192-221.
- [3]吴启焰.大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1: 58-61.
- [4]冯健, 周一星.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及其演化(1982-2000) [J].地理研究, 2003, (4):465-483.
- [5] Wu, Fulong,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Shanghai's real estate market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2, 34: 1591-1615.
- [6] 李志刚. 中国城市的居住分异[J]. 国际城市规划, 2008,23(4):12-18.
- [7]Clark, William A.V. and Huang, Youqin. Linking Migration and Mobility: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Effects in British Housing Markets [J]. Regional Studies, 2004, 38(6):617-628.
- [8] McKenzie, Roderick D.; Park, Robert Ezra; Burgess, Ernest Watson. The Cit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 [9]Clark, William A. V..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American Cities: A Review and Interpretation [J].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1986, (5): 95-127.
- [10] Massey, Douglas and Denton, Nancy .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11]Sit, Victor F. S. Beijing: the Nature and Planning of a Chinese Capital City [M].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1995.
- [12]Yeh, Anthony Gar-On, Xu, Xueqiang, Hu, Huaying. The Social Space of Guangzhou City, China [J]. Urban Geography, 1995. 16 (7):595-621.
- [13] Huang, Youqin and William A.V. Clark. Housing Tenure Choice in Transitional Urban China: A Multilevel Analysis [J]. Urban Studies, 2002, 39: 7-32.
- [14] 郑思齐.住房需求的微观经济分析-理论与实证[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66-67.
- [15]Wu, Weiping. Migrant Housing in Urban China: Choices and Constraints[J]. Urban Affairs Review, 2002, 38(1): 90-119.
- [16]Ma, Laurence J.C. and Xiang, Biao. Native Place, Mig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Peasant Enclaves in Beijing [M]. China Quarterly, 1998,(155): 546-81.
- [17]Chan, Kam Wing. Post-Mao China: a Two-class Urban Society in the Maki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6,20(1): 134-150.
- [18]Massey, Douglas and Denton, Nancy . The Dimensions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J]. Social Forces, 1988, 67(2): 281-315.

作者简介:

黄友琴(1970-),女,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地理与规划系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住房和城市发展。易成栋(1972-),男,汉族,博士,北京中央财经大学城市与房地产管理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房地产与城市经济。

Hukou, Mobility, and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 A Case Study of Wuhan City

HUANG Youqin, YI Chengdong

[Abstract] The ongoing housing reform and rapid urbanization in Chinese cities have resulted in massive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migration, which has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spatial sorting among urban neighborhoods. A previously homogenous society that was mainly made of work-unit compounds is being transformed into a society with increasing diversity and stratification,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new communities such as crowded migrant enclaves and affluent gated communities. Residential sorting and segregation is increasing and residential location is becoming a symbol for socio-economic statu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hukou, rising mobility and migration on neighborhood differentiation, using the 0.1% survey data in 2000 census in Wuhan. There is significant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groups defined by hukou status and mobility, such as local urban residents who never moved, local residential movers, permanent migrants, and temporary migrants. They liv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ity, and there is low-to-moderate degree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between them. While the overall degree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s not high compared to the Western standard, segregation for certain groups at certain parts of the city especially at the suburbs is already alarmingly high.

[Key word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 Migration; Mobility ;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 Wuhan